

山西农业生产先进經驗丛书之三

棉花生产上的大寨

杨 谈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农业生产先进經驗丛书之三

棉花生产上的大寨——楊談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太原

目 录

- 一、棉花生产上的大寨——楊談
.....《山西日报》社論 (1)
- 二、楊談棉花稳产高产經驗
.....曲沃县楊談大 王德合 (9)
队党总支書記
- 三、迎着困难前进.....曲沃县楊談大 王德合 (35)
队党总支書記
- 楊談大队一九六四年棉田抗灾記

棉花生产上的大寨——楊談

《山西日报》社論

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我省曲沃县杨谈公社杨谈大队被誉为“棉花生产上的大寨式的典型”。换句话说，也就是“棉花生产上的大寨”。这是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给予杨谈社员和干部的一个很大的荣誉，而杨谈社员和干部也以自己用大寨的革命精神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对于这个荣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杨谈不愧为“棉花生产上的大寨”，首先是因为杨谈人也象大寨人那样，具有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切实解决了为什么生产，为什么劳动的问题。陈永贵同志说：大寨人所以那样辛勤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贡献力量。杨谈人也说：“农民种地和工人做工、战士拿枪作战一样，都是为了革命。”这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劳动，

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有了这样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他们就站得高，看得远，懂得用自己的行动为党和国家争光，为全国人民争气。比如当冰雹砸毁了棉花，而国际友人要来参观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投入抢救活动，用社员李春娥的话说，这就是为着“让我们的国际朋友看看：中国人多有志气！让那些咒骂我们的人知道：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人民公社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正因为有了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他们就能自觉地以自己小集体的局部利益去服从国家的大集体的整体利益。比如当棉花发生了严重的病害，大片大片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坚决摒弃毁掉棉花种大秋的主张，毅然采取了补苗的措施。而这，为的就是“多种一苗棉花，多给国家贡献一分力量！”“毁了棉花种大秋，光是对社员和小集体有利，而补种棉花，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他们说：“我们不能光管自己不顾国家！心中要有个全面观点，要有国家观念。”正是因为有了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他们就从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总是在攀上一个高峰之后，就去攀另一个高峰，永不停顿自己的脚步；而在任何困难的情

况下，也总不苟安自得，而是站得稳，挺得起，想拼不服输。杨谈大队的事实表明，引导农民革命化的根本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什么劳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使得人们真正是胸有全国、胸有世界，胸有革命，胸有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着革命，为着社会主义而镢每一锹，刨每一镩，那就会开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就会胜不骄，败不馁，既经得住困难的考验，又经得住胜利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奔腾不息，勇往直前。

杨谈大队社员们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是杨谈大队党总支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坚持“四个第一”，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头脑的结果。在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的整个进程中，杨谈大队党总支很注意引导社员苦练技术硬功，很注意实行科学的管理，但更注意坚持政治挂帅。他们创造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的经验。而从去年开展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寨运动以后，他们更自觉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为全盘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建立起坚强的政治工作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渗透到整个经济活动之中，处处抓活思想，处处突出政治。这样，

就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开辟出一个更新的境界。在这里，杨谈党总支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巨大作用。

杨谈不愧为“棉花生产上的大寨”，还因为他们对待灾害，对待困难，也象大寨人那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搞革命，总是要遇到困难的，进行农业生产，也不可能不碰灾害。对于灾害、困难，要重视它，但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敢于藐视它，敢于和它斗。没有战略上的藐视，战术上的重视便无从谈起。正象杨谈人说的，要打胜仗，首先不能叫敌人吓住。大寨人是困难吓不倒的英雄，杨谈人也是灾害压不垮的好汉。在一九六四年棉花生长的日子里，“老天爷”给杨谈人民设下的难关是够多的，病、虫、雹、涝、风一灾接着一灾，真是七灾八难，接踵而来。但杨谈人们说：

“来就来吧，较量较量有好处”。看，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他们正是凭着这种英雄气概，敢于藐视灾害，敢于同灾害斗争，结果，“老天爷”设下的重重难关没能难倒他们，七灾八难没能降服他们，恰恰是他们斗倒了七灾八难，战胜了“老天爷”。他们说：“灾害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这是经验之谈，也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

杨谈人民为什么不怕灾害，敢于同灾害斗争？除了因为他们有宽广的革命胸怀和旺盛的革命意志而外，还因为杨谈党总支和大寨党支部一样，敢于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杨谈党总支所以敢于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又在于它和大寨党支部一样，坚信群众的历史创造力。

他们懂得，自力更生之力，力争上游之力，都是在千千万万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之中。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级社起，他们就是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把五千多块遍地枣刺和石头的瘦地建成了三千多块既耐旱又耐涝的水平梯田，把棉花产量从三十来斤提到一百多斤的。一九六四年灾害那样多，那样重，困难那样大，但由于他们相信群众力量，坚持自力更生，从而征服了灾害，战胜了困难，开创了胜利的新局面。正因为如此，才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群众的创造力；并且引导群众从艰苦奋斗的锻炼中，大长了革命志气，增强了夺取胜利的信心，从而愈战愈强，愈练愈硬，终于形成了一支无难不克，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敢不敢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衡量是不是真正革命派的一条根本分界线。杨谈大队党总支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是称得起真正的革命派的。

杨谈不愧为“棉花生产上的大寨”，还因为他们也象大寨人民那样，处处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全面地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工作越是搞得越好，他们就越注意找差距；越是受表扬，就越要找缺点；当着灾害发生困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又强调看到光明，找有利条件，引导人们不是想着“完了，完了”，而是想着“抗灾，抗灾”、“丰收，丰收”；他们承认，灾害能带来困难，但他们又能看到困难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锄掉棉苗这是消极因素，他们却从女社员姜松香锄掉一棵棉苗，装在口袋里带回来，主动请队干部扣工分的行动中，找到了制止伤苗的积极力量；当着五月阴雨连绵，棉苗大量病死的时候，他们懂得下雨多了是害，但同样又从中看出，墒足对补苗有利；当着秋天下雨多，活儿又不能不干的时候，他们又利用空隙，找出了下小雨，顶着干；不下雨，抢着干；停一阵，挤着干的战术，以至到最后棉花比前年减产了，却要开个庆祝会。从他们对于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干部的工作方法，直到与自然斗争的战术，无处不显示着

唯物辯証法的力量。杨谈的干部和社员，由于懂得并且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每一件事情的正面和反面，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现象和本质等，进行全面分析，全面观察，因时因地机动灵活地决定与自然斗争的战术，所以防止了思想的僵化，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表现出智勇双全，能发挥出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并且在各种情况下，总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杨谈大队干部和社员善于运用唯物辯証法的本领，和他们不断地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分不开。他们坚持以毛澤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反过来，又通过不断总结自己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更加深了对毛澤东思想的领会程度，逐步提高了运用唯物辯証法的能力。这样就使得他们的行动增强了自觉性，减少了盲目性，使主观认识越来越接近于客观规律。

从上述可以看出，杨谈所以是“棉花生产上的大寨”，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因为他们也象大寨一样，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整个过程和一切工作中，高举了毛澤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綱，处处突出政治，切切实实加强了思想政治工

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全盘工作的基础。正是从杨谈人民所创造的令人振奋的成就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毛澤东思想光辉，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綱的威力，看到了政治挂帅的作用。

杨谈，为全省产棉区大面积大幅度地增产棉花，实现棉花高产，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也为其他地区的大队和生产队改变自然面貌，加速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样板。让我们象“棉花生产上的大寨”——杨谈一样，更充分地发扬大寨的革命精神，坚持毛澤东思想挂帅，坚持“四个第一”，不断引导干部和社员革命化，在今年的生产新高潮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为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1965年3月8日《山西日报》）

楊談棉花穩產高產經驗

曲沃縣楊談大隊黨總支書記 王德合

人窮志不窮 越窮越要革命

我們楊談大隊，在山西省曲沃縣塔兒山腳下，有九個自然村，十四個生產隊，七百四十八戶，三千七百口人。方圓十五華里。耕地一萬五千畝，每人平均四畝多，全是丘陵旱地。

解放以前，生產水平很低，常年小麥產量只有百十斤，棉花畝產也不過三十來斤。解放後，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運動，實現了公社化。我們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努力改造自然條件，使棉糧產量都得到了不斷的提高。特別是自一九六一年以來，雖然經歷過大旱、大澇的災害，但由於水土保持和增施肥料已有相當基礎，更由於大抓政治思想教育，大搞技術革命，並加強勞動管理，全

大队的棉花亩产，一直稳在百斤以上。小麦产量也不断上升。

先说棉花。一九六一年，二千三百七十一亩棉花，首次突破百斤关，亩产皮棉一百斤零五两；一九六二年，三千三百零三亩棉花，亩产一百零五斤；一九六三年，三千八百五十亩棉花，亩产达到一百三十八斤。一九六四年是个少有的涝年，前期棉田大量发病死苗，后期烂铃、晚熟，七月中、下旬还连续遭受了两次雹灾。全体社员和灾害斗争了一年，全大队四千二百亩棉花，亩产仍达一百一十斤三两。

我们那儿粮食主要是小麦。以棉促粮，以粮促棉，取得了粮棉双丰收。一九六一年，九千七百亩旱地小麦，亩产只有一百三十斤；一九六二年，八千九百亩小麦，亩产二百二十斤；一九六三年，八千亩小麦，亩产二百八十斤；一九六四年，七千六百多亩小麦，亩产达到三百二十斤。

随着粮棉产量逐年提高，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公共积累愈来愈多，社员生活大大改善。

·交售棉花：一九六一年，二十三万斤；一九六二年，三十三万斤；一九六三年，五十二万斤；一九六四年，四十七万斤。交售小麦：一九六一年，

三十七万斤；一九六二年，五十万斤；一九六三年，八十万斤；一九六四年，一百万斤。

公共积累，一九六四年累计达到一百万元，还购买了三辆汽车。每户平均一千三百三十多元。储备粮一百一十五万斤，每户平均一千五百斤。

社员分红，一九六一年每人一百零五元，口粮三百七十斤；一九六二年一百十五元，口粮四百斤；一九六三年一百二十二元，口粮四百斤；一九六四年，社员平均每人分红一百一十五元，口粮每人四百斤，其中小麦三百斤。

一九六四年年底大总结的时候，社员们高兴的说，去年我们是“三个八十万”（交售小麦八十万，公共积累八十万，储备粮食八十万），一年之间，变成了“三个一百万”（交售小麦一百万斤，公共积累一百万元，储备粮食一百一十五万斤）。

上面说的是现在的杨谈。下面简单介绍介绍过去的杨谈。提起旧杨谈，令人心酸。人又穷地又瘦，人都说杨谈有五多、三缺——地是“块块多”、“石头多”、“枣刺多”，村里是“穷人多”、“吃斗儿帐（高利贷）的人多”。由于土薄水缺产量低，给杨谈人带来了“缺吃”、“缺穿”、“缺水喝”。人穷。杨谈老早以前，是姓杨

姓谈的两大姓，经过历史上的几次大灾荒，死的死来逃的逃；现今姓谈的只剩下一户，姓杨的一户也没有了。如今的人，大多数是从山东、河南逃荒来的，在沟里挖个窑洞就住了下来。直到解放前，全大队有一百七十户给地主富农扛长工，四百零八户背斗儿帐，五十多户靠要饭生活。现在担任五队指导员的李来旺，那时候穷得连衣裳也穿不上，他娘披着—张羊皮过了三冬。地瘦。杨谈过去的土地，怕涝又怕旱。一万五千多亩地就有五千多块，遍地是枣刺，到处是石头。天旱，人瞪着两眼没有办法，井深三四十丈，别说浇地，连人和牲口吃水都成问题。下场大雨，水从山上冲下去，地又冲成了七沟八壑，水土流失很严重。

今昔一对比，大家就知道我们大队走过的道路，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与天、与地、与困难、与贫穷斗争的道路。我们就是人穷志不穷，越穷越要革命。

抓养猪积肥，开始革命

怎样革命？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只知道一条简单的道理，“种地无巧，上粪就好”，于是开始先

抓了个养猪积肥。

一九五三年，初级社才成立，满共十六户社员，家底薄，我们先办了一座小粉房。缺家具，就东拼西凑；缺牲口，我们到亲戚家里赊来了一头小毛驴；买不起猪，又向人家借钱先买来了一口红毛母猪。满打满算，家底不到一百元，就这还是借下的。我们就凭着这一头小毛驴一口红毛猪起家。我们想快点把猪发展起来，便派人到晋东南买回二十多口猪，因为路程远，路上赶得又快，买回的猪没几天就全死光了。

高级社成立后，我们还是大抓养猪积肥。又从运城县和陕西武功县买回来一百多头大白猪。这次又给猪新修圈、做门帘、生起了火，那知事不遂心，赶回来后，又大批的死，最后只剩下十几口了。

从几次远地买猪我们接受了教训，深深认识到，要发展养猪事业，必须靠“自繁自养”。就凭那十几头大母猪繁殖，生下小猪，见母猪就留，留下再养，养下再选。到一九五七年初，集体养猪就发展到四百多头，基本上消灭了死猪现象。

一九五七年冬季，虽然集体养猪大发展了，但是社员养猪很少，公养、私养总数才达六百多口，

不能解决肥料问题。怎么办？党总支在认真学习了党的有关养猪事业的方针政策后，采取了两条腿走路办法，一方面发展集体养猪，一方面扶持社员养猪。党总支还作出了扶植社员养猪的十条规定。明确宣布：养猪给留饲料地；贷给社员仔猪；统一修猪圈；按质论价，收买猪粪等等。

十条规定一宣布，很受社员欢迎，社员的养猪很快形成运动。到来年秋天，社员个人养猪就由三百多口增加到一千多口。

公也养、私也养、养猪事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到一九五八年春天，光集体养猪就发展到一千多口。猪多了，由于管理工作赶不上去，又出现了大批死猪的现象。这时又引起了一场风波。有的说“有钱不买张口货，光顾养猪，耽误了生产，大家吃什么，花什么”。一吵闹，不少社员也没了主见，有些人干脆要求停止集体养猪。一些干部也悲观起来。党总支给大家算了一笔帐：全社平均每户养到两口猪，每亩就可以施到两大车猪粪，每亩能增产六十斤小麦或二十斤皮棉……，这怎么能叫耽误生产呢？又经过一场辩论，思想认识才统一了，养猪道路又坚持下来了。

为了加强对养猪工作的领导，在猪场建立了党